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 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李培林 李 炜

提要: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文基于对 2006 年在中国 28 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还发现收入 and 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关键词: 农民工 经济地位 社会态度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的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一个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在过去的研究中,更多的研究集中在阐述改革开放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而对于社会结构转型本身带来的社会收益,还研究得不够。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其要素之一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如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即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了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刚性。而中国在改革之初,社会结构的弹性依然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

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过去在测算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因素时,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剩下的一块,我们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且往往简单地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但最近据专家测算,仅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中国 1978—1998 年 GDP 增长的贡献就占 20% 以上,要远高于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蔡昉、王美艳, 2002)。

但西方有很多学者一直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中国也有学者把进城的农民工视为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如早在 1994 年民工潮初起的时候,中国就有学者预言“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反社会的心理将长久地影响曾一度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大的动荡,无业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王山, 1994: 62—63)。

然而,现在人们更多地把农民工视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不是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据专家估计,农民工每年给城市经济创造 1—2 万亿元人民币的 GDP 增量,并为农村增加 5000—6000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 2006: 62)。另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测算,目前北京市农民工的劳动力贡献,在建筑业占 83%,在批发零售业占 49%,在制造业占 2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 2006: 365)。

中国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称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2006 年 1 月 18 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这是“农民工”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人民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

近十几年来,“农民工”在中国一直是学术界、政策制定部门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在 1984 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经被称为“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1984 年,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拉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1985—1990 年,从农村迁出的总人数还只有约 335 万,而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 2286 万人,乡镇企业仍是农民在职业上“农转非”的主渠道。但 1990—1995 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根据多项大规模的全国抽

样调查结果,外出打工的流动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平均在15%左右,据此推算1995年达到6600多万人,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农村劳动力2754万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开始下降,而进城流动民工的人数仍在快速增加。根据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农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调查,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1.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4%左右。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他们平均年龄28岁左右,绝大多数为初中教育水平,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3—4)。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没有引发社会的动荡?处于城市低收入地位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城市聚集居住并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规模的集群行为?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我们在2006年3—5月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0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3份,调查误差小于2%,符合统计推断的科学要求。^①

二、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②

从月工资收入的比较来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

① 此项调查按照严格的科学抽样方法,以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式。首先,采用城镇人口比例、居民年龄、教育程度、产业比例4大类指标7个变量,对东中西部的2797个区市县进行聚类分层,在划分好的37个层中,采用PPS方法抽取130个区市县,在抽中的每一区市县中,采用PPS方法抽取2个乡镇/街道,共抽取了260个在抽中的每一乡镇/街道中,采用PPS方法抽取2个村/居委会,共抽取520个收集抽中村/居委会中所有居民个人或家庭的名单资料,共覆盖160余万人,近50万户居民。然后,在此抽样框中,采取PPS方法抽样,最后抽中7100样本户,覆盖全国28个省市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可推断全国居民总体、分城乡居民人口总体、分东中西部居民人口总体。

② 本文中农民工的界定是具有农业户籍身份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工资收入者;城市工人指非农户户籍身份的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工资收入者。两者的职业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

1346 元的 68.4%，而且 80% 的农民工月工资在千元以下，甚至有 27% 的农民工月工资在 500 元及以下(见表 1)。

表 1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月收入比较 (%)

月薪	农民工 N=738	城市工人 N=1126
500 元及以下	27.1	17.1
501—1000	52.2	37.0
1001—1500	13.9	21.8
1501—2000	3.8	11.2
2000 以上	3.0	12.8
总计	100.00	100.00
平均月薪: 元	921	1346

$$X^2=111.83, P<0.001$$

从劳动时间上看, 农民工在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工人的情况下, 平均劳动时间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尽管中国实行 8 小时工作制, 但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56.6 小时, 比城市工人每周平均 47.9 小时的劳动时间要多 8 个小时。有 81.4% 的农民工劳动时间超出法定的每周 40 小时, 有约 34% 的农民工每周工作在 60 小时以上(见表 2)。

表 2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周工作时间比较 (%)

每周工作时间	农民工 N=762	城市工人 N=1146
不足 20 小时	2.31	2.59
21—40 小时	16.29	44.22
41—60 小时	47.83	39.50
61—80 小时	25.85	10.32
80 小时以上	7.71	3.37
总计	100.00	100.00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小时	56.6	47.9

$$X^2=199.53, P<0.001$$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 在年龄、

职业、地域、教育等各种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即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水平。从受教育情况看,农民工中有45%具有初中教育水平,但也有25%只有小学教育水平,还有13.3%未受过正式教育;而在城市工人中,约70%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有34%具有大学教育水平。从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水平来看,农民工中从事体力和半体力劳动的比例高达83.3%,而城市工人有近一半人(49.2%)从事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

表3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技能比较 (%)

工作技能	农民工 N=769	城市工人 N=1152
需要很高专业技能的工作	3.63	14.03
需要较高专业技能的工作	12.99	35.18
半技术半体力工作	43.03	31.33
体力劳动工作	40.35	19.46
总计	100.00	100.00

$$\chi^2 = 226.51, P < 0.001$$

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当引入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等因素来考察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时,农民工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竟然消失了(见表4)。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数较多、能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男性、有管理职位、就业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市区的农民工和城镇工人,都会得到较高的工资;当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城市工人并无显著差别。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因为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工作待遇差异,主要不是在工资收入方面,而是在社会保障方面(见表5)。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

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即使在同样的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的条件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拥有的社会保障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见表6)。城市工人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报销的机会分别是

农民工的 2.99 倍(1:0.335)、3.22 倍(1:0.311)和 1.62 倍(1:0.619)。

表 4 各类因素对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工资收入的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类型	自变量	非标准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 归系数
常数	-447.84 *	228.69		
身份	农民工(对照组:城市工人)	36.80	76.69	.015
人力资本	劳动技能(对照组:体力工作)			
	高级专业技能工作	656.41 ***	109.90	.167
	较高专业技能工作	264.44 **	83.23	.098
	半技术半体力工作	154.25 *	69.75	.061
	受教育年	64.97 ***	9.78	.205
	年龄	1.67	2.86	.014
	男性(对照组:女性)	256.03 ***	54.49	.102
工作状况	周工作时长	4.04 *	1.83	.052
	管理职位(对照组:无管理职位)	342.82 ***	73.81	.105
就业地点	就业场所(对照组:乡村)			
	大中城市市区	330.37 ***	83.47	.136
	小城镇	-107.52	79.66	-.040
	就业区域(对照组:西部)			
	东部	413.43 ***	71.04	.171
中部	-99.41	76.48	-.038	
R ² =0.223	N=1713			

注:“*”, P<0.05; “**”, P<0.01; “***”, P<0.001。

表 5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社会保障待遇比较 (%)

社会保障	农民工 N=769	城市工人 N=1152	X ²	P
有养老保险	16.3	67.3	485.72	.000
有失业保险	6.2	44.5	365.98	.000
有医疗报销	28.4	66.3	307.72	.000

三、农民工意外地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

按照一般的社会分层理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决定着人

表 6 各类因素对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享有社会保障的 Logsit 回归分析

变量类型	自变量	模型 1: 养老保险		模型 2: 失业保险		模型 3: 医疗费报销	
		B	Exp ¹ B ¹	B	Exp ¹ B ¹	B	Exp ¹ B ¹
身份	常数	-3.321***	.036	-2.289***	.101	-2.866	.057
	农民工 ¹ 对照组: 城市工人 ¹	-1.092***	.335	-1.168***	.311	-.479**	.619
人力资本	劳动技能 ¹ 对照组: 体力工作 ¹						
	高专业技能工作	.397	1.488	.650*	1.916	.873**	2.394
	较高专业技能工作	.481*	1.617	.263	1.300	.358	1.430
	半技术半体力工作	.308	1.361	.043	1.044	.132	1.141
	受教育年数	.101***	1.106	.103***	1.109	.127***	1.135
工作状况	男性 ¹ 对照组: 女性 ¹	.033***	1.034	.012	1.012	.044***	1.045
	周工作时长	.211	1.235	.321*	1.378	.279*	1.322
管理职位	周工作时长	-.018***	.983	-.030***	.971	-.014**	.986
	管理职位	.138	1.148	.216	1.241	.357	1.429

续表 6

变量类型	自变量	模型 1: 养老险		模型 2: 失业险		模型 3: 医疗费报销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单位类型	单位类型(对照组: 个体单位)						
	公有制单位	1.916***	6.793	1.602***	4.962	1.583***	4.868
	私营单位	1.050***	2.857	.824**	2.279	.377*	1.457
就业地点	就业场所(对照组: 乡村)						
	大中城市市区	1.032***	2.808	.739***	2.093	.013	1.013
	小城镇	.378	1.459	-.007	.993	-.466*	.627
	就业区域(对照组: 西部)						
	东部	.410*	1.506	-.058	.943	.162	1.175
	中部	-.384*	.681	-.631***	.532	-.787***	.455
	N	1594		1559		1519	
	-2 Log Likelihood	1568.87		1473.23		1644.8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们的社会态度。这也是一些学者把农民工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的调查却发现, 农民工并没有因其经济地位而表现出更加突出的社会不满情绪, 反而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

在社会安全感方面, 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我们在调查中把社会安全感分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劳动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私安全七个方面, 农民工的评价较高, 7 项社会安全感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其中只有在“劳动安全”感方面,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差异较小(见表 7)。

表 7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社会安全感比较 (%)

社会安全感	农民工	城市工人	X ²	P
个人信息、隐私安全	89.74 (N= 714)	78.93 (N= 1099)	65.27	0.000
人身安全	87.18 (N= 744)	75.79 (N= 1136)	68.37	0.000
财产安全	83.95 (N= 742)	77.28 (N= 1133)	43.79	0.000
劳动安全	79.14 (N= 734)	77.47 (N= 1127)	23.81	0.000
医疗安全	70.07 (N= 721)	60.11 (N= 1093)	39.78	0.000
食品安全	65.57 (N= 735)	45.30 (N= 1131)	104.47	0.000
交通安全	65.24 (N= 740)	60.54 (N= 1139)	39.98	0.000

在社会公平感方面, 农民工的总体社会公平感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见表 8)。在 14 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中, 农民工的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的有 11 个领域, 包括政治权利、财政税收政策、就业机会、收入分配、教育、地区/行业待遇等领域, 只有在司法执法、社会保障、城乡待遇 3 个领域, 农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就业、收入分配、发展有关的社会领域——如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的分配、不同地区/行业间的待遇——农民工的公平感更是大大高于城市工人, 均高出 10 个百分点以上。而人们通常认为, 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之所在。

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很满意+比较满意)方面, 农民工总体上也同样一般高于城市工人。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 6 个方面, 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见表 9)。

特别令人意外的是, 收入较低, 通常被人们认为在城市受到不公正

待遇的农民工,在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方面,不如城市工人强烈,回答“有严重冲突”和“有较大冲突”的比例仅为城市工人的一半;认为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绝对会激化”和“可能会激化”的比例也比城市工人低 16 个百分点。当然,对这一问题“说不清”的农民工比例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见表 10)。

表 8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社会公平感比较 (%)

公平认同的领域	农民工	城市工人	X ²	P
高考制度	85.70 (N=662)	82.02 (N=1065)	16.51	.001
义务教育	80.83 (N=730)	77.31 (N=1129)	14.84	.002
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73.90 (N=691)	67.57 (N=1055)	11.59	.009
财政和税收政策	66.05 (N=675)	58.65 (N=987)	19.27	.000
每个人的发展机会	63.48 (N=730)	53.04 (N=1097)	32.52	.000
司法与执法	62.81 (N=668)	63.76 (N=1034)	11.81	.008
公共医疗	57.10 (N=707)	52.48 (N=1091)	14.69	.002
工作与就业机会	53.71 (N=735)	40.99 (N=1109)	35.56	.000
财富及收入的分配	45.20 (N=718)	33.46 (N=1083)	34.98	.000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42.68 (N=682)	48.60 (N=1072)	24.47	.000
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	41.43 (N=682)	31.31 (N=1041)	23.02	.000
提拔干部	38.46 (N=660)	33.77 (N=1027)	16.23	.001
城乡之间的待遇	30.96 (N=712)	30.54 (N=1053)	7.50	.058
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	67.10 (N=708)	58.70 (N=1096)	38.80	.000

表 9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对地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比较 (%)

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	农民工	城市工人	X ²	P
义务教育	80.53 (N=713)	72.73 (N=1101)	17.95	.000
科技发展与推广	78.31 (N=658)	76.12 (N=1020)	25.92	.000
发展经济	77.01 (N=717)	78.54 (N=1088)	18.35	.000
树立良好社会风气	72.48 (N=721)	64.98 (N=1101)	23.35	.000
维护社会治安	68.48 (N=743)	62.15 (N=1129)	29.47	.000
实现社会公正	67.56 (N=693)	60.16 (N=1063)	25.44	.000
依法办事	65.62 (N=705)	60.82 (N=1062)	25.57	.000
医疗卫生服务	62.11 (N=734)	60.53 (N=1103)	7.67	.053
环境保护	59.76 (N=740)	52.43 (N=1128)	15.85	.001
社会保障和救助	54.62 (N=680)	55.66 (N=1034)	8.76	.033

表 10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对地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比较 (%)

我国是否存在 社会群体之间的 利益冲突	农民工 N= 769	城市工人 N= 1152	社会群体之间的 利益冲突 是否会激化	农民工 N= 769	城市工人 N= 1152
有严重冲突	4.21	7.29	绝对会激化	2.90	8.34
有较大冲突	14.42	30.10	可能会激化	35.89	46.08
有一点冲突	49.55	44.91	不太可能激化	32.21	27.94
没有冲突	16.92	9.30	绝对不会激化	5.96	5.07
说不清	14.90	8.41	说不清	23.03	12.57
总计	100.00	100.00	总计	100.00	100.00
X ² = 77.95, P< 0.001			X ² = 32.45, P< 0.001		

四、对农民工具有的积极社会态度的解释

为什么收入较低、被人们认为在城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工会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呢？如何解释这种不符合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态度的现象呢？

解释之一是与农民工对自身境遇的归因有关。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低下，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所致，而非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后果。从表 3 的回归分析中可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因户籍身份导致的劳动报酬歧视并不明显。面对这种境遇，要提升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识技能的提高。这也反映在调查中，农民工比城市工人更重视努力程度和教育对个人成功机会的影响（见图 1）。社会保障待遇方面的户籍差异虽然普遍存在，但对于农民工而言，这毕竟不如获得就业岗位和增加收入来的直接与重要。因此，即便农民工为社会公众视为“弱势群体”，但他们自身还是认为存在着“个人发展”和“工作与就业”的机会公平，他们并未将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inequality），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injustice）。

解释之二是和农民工的生活期望与权利意识有关。一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期望也低，因而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等社会评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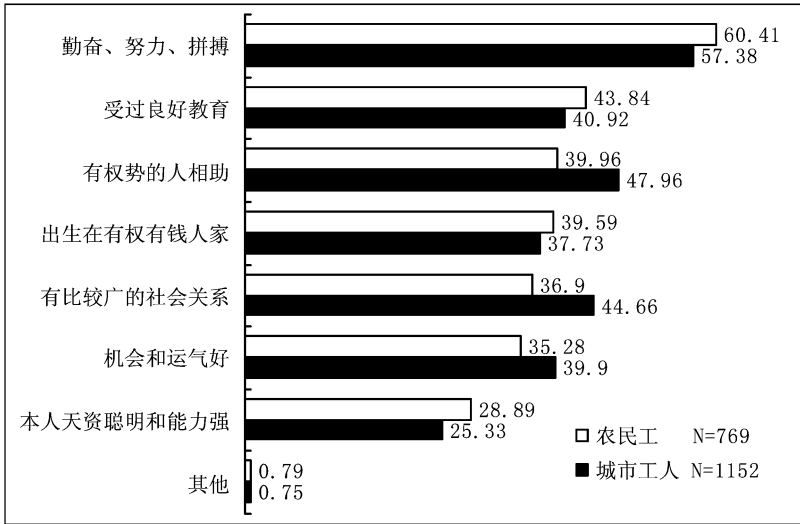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对个人成功的归因比较(%)

就更加积极。相关分析表明,上述的社会评价对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的感知存在着负相关。也就是说,社会安全感越高、公平感越高、满意度越高、社会信任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对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感受就越弱,就越不容易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有强化的趋势(见表 11),而农民工正是这样的对社会高评价的群体。

另一方面,农民工也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比如根据调查结果,在民主意识方面,和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性,较高的权威服从。如“公共场所个人不必负责”和“投稿报纸参加讨论的人是出风头”的赞同率农民工均高于城市工人;而对“民主就是政府为人民做主”、“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政府搞建设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等判断,农民工赞同的比例也都高于城市工人(见表 12)。相关分析也表明,民主—权利意识和对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的感知存在着正相关(见表 11),也就是说,民主—权利意识越低的人,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就越不敏感。

解释之三是与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有关。农民工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生活相比较。换句话说,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更容易产生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比如在主观认同上,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相比,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群众”、“乡下人”、“低

表 11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社会利益冲突感知与社会评价
的相关分析^① (Pearson 相关系数 r)

	社会 安全感	对政府工 作满意度	社会 信任度	社会 公平感	民主一权 利意识	受教 育年
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程度的感知	-.265** (N=1472)	-.300** (N=1220)	-.258** (N=965)	-.281** (N=1112)	.200** (N=1443)	.221** (N=1709)
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激化趋势的感知	-.205** (N=1397)	-.258** (N=1149)	-.242** (N=915)	-.219** (N=1049)	.170** (N=1362)	.185** (N=1599)

注：“**”， $P < 0.01$ 。

表 12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在民主一权利意识方面的比较 (%)

民主一权利观念(赞同率)	农民工	城市工人	X ²	P
公共场所就是个人不必负责的场所	17.78 (N=740)	8.72 (N=1145)	49.18	0.000
政府搞建设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	52.48 (N=699)	47.02 (N=1092)	9.85	0.020
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	66.11 (N=738)	53.80 (N=1108)	29.46	0.000
给报社投稿参加讨论的人是喜欢出风头的人	24.60 (N=674)	13.02 (N=1098)	40.87	0.000
民主就是政府为人民做主	77.45 (N=725)	61.60 (N=1117)	51.21	0.000
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	44.61 (N=742)	26.11 (N=1136)	71.75	0.000
老百姓交了税,政府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14.41 (N=747)	8.92 (N=1135)	29.86	0.000

学历者”和“体力劳动者”，与此同时，我们却发现，农民工却并不比城市工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穷人”、“雇员”和“被管理者”；和农民相比，农民工对自己是“穷人”、“乡下人”、“低学历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认同更少一些(见表 13)。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地位认同的比较中，农民工甚

① 表 11 中，社会安全感由 7 项有关社会各领域的的安全度评分题目合成；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由 10 项有关政府工作的评分题目合成；社会信任度由 13 项对政府、政府信息、政府人员、社区、社会组织、传媒等方面的信任评价题目合成；社会公平感由涉及 13 个社会生活层面公平程度的评分合成；民主一权利意识由 7 项有关政府一 个人权利、社会参与的陈述题目合成。上述题目的分值越低，表示某方面的程度越低(弱)，分值越高，表示某方面的程度越高(强)。

至并不比城市工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下层,虽然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农民工略少于城市工人,而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和“下层”的农民工略高于城市工人,但差异很小(见表 14)。

表 13 农民、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比较 (%)

身份认同	农民 N= 2703	农民工 N= 769	城市工人 N= 1152	X ²	P
穷人	80. 83	71. 82	70 20	8 94	. 011
群众	98. 79	96. 25	86 77	253 03	. 000
乡下人	98. 89	89. 83	15 31	3358 83	. 000
雇员	42. 03	84. 68	88 05	229 59	. 000
被管理者	47. 04	80. 50	81 02	52 66	. 000
低学历者	94. 23	88. 04	59 18	805 66	. 000
体力劳动者	96. 56	77. 52	44 14	1330 20	. 000

表 14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在经济社会地位认同上的比较 (%)

社会经济地位认同	农民工 N= 769	城市工人 N= 1152
上	. 70	. 36
中上	5 15	5 60
中	41 93	43 82
中下	30 63	31 61
下	21 26	18 34
不好说	. 33	. 27
总计	100 00	100 00

$$X^2=3. 55, P= 0. 471$$

正是由于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他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过去 5 年来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和对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更积极。有 72. 3%的农民工认为过去 5 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 62. 7%的农民工认为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约 10 个百分点(见表 15)。

表 15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在生活评价、生活预期方面的比较 (%)

5 年来 生活水平	农民工 N= 769	城市工人 N= 1152	未来 5 年 生活水平	农民工 N= 769	城市工人 N= 1152
上升很多	10. 94	8. 09	上升很多	11. 49	10. 21
略有上升	61. 38	53. 13	略有上升	51. 27	43. 77
没变化	18. 81	22. 71	没变化	12. 33	18. 63
略有下降	6. 21	10. 69	略有下降	4. 48	8. 75
下降很多	2. 18	4. 67	下降很多	1. 52	2. 59
不好说	. 50	. 72	不好说	18. 91	16. 06
总计	100. 00	100. 00	总计	100. 00	100. 00
$X^2= 30.75, P< 0.000$			$X^2= 31.95, P< 0.000$		

五、结论和相关政策讨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其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工人,而其劳动时间多于城市工人;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差别;第三,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工人,这种社会保障的差异,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以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有关;第四,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反而呈现出预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这种状况的形成更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向上走的利益曲线,以及他们更容易把农民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具有社会政策含义的结论是: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渠道,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也就是应当主要通过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仅仅依赖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最大的非市场化差异或身份差异,集中在社会保障状况方面。户籍体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相联系,对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抓紧建立适合于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应当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把农民工作为新市民看待,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性障碍,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最后,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完全靠农民进城生活来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归结点,是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主要不再依靠土地种植收益,也能过上城市水准的生活。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农民工,不仅因为最早进入真正的劳动力竞争市场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因为承担起中国工厂制造的主力军角色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真正从深层决定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可能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而是历史决定逻辑。

参考文献:

- 蔡澍、王美艳, 2002,《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新视野》第4期。
- 戴灼(F. C. Deyo)编, 1991,《经济起飞的新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 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 李培林, 1996,《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 2000 *Job Searching, Employ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培林主编, 2003,《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毅夫、蔡澍、李周, 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世界银行, 2004,《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王山, 1994,《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周业安、赵坚毅, 2004,《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中国经验》,《管理世界》第5期。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i, Fang & Dewen Wang 2003,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The China Review* 3(2).
- Deyo, Frederic C. 1995, "Capital, Labor, and State in Thai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Josef Borocz & David Smith (eds.), *A New World Order? Glob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 2000, "Reform, Globalization, and Crisis: Reconstructing Thai Labour."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Australia) 42: 2 (June).

- Koo, Hagen 2001,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n, Justin Gewei Wang & Yaohui Zhao 2004,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3).
- Krueger, A. O. 1992,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Krugman, Paul 1994, "The Myth of Asian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 Stark O. & J. E.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1.
-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aohui 1999,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4).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渠敬东

PAPER

Migrant Worker's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Attitude in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Li Peilin & Li Wei* 1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connoting those who used to be farmers but now have left rural areas and found jobs in cities are becoming a new group resulted from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group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burgeoning labor market in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eding up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as well as its modernization driv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alysi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in 2006, which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covered 2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ome statu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depends heavily on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skills they have developed instead of the factor of identity-based discrimination. It was also found, to everybody's surprise, that those of less income and lower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show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 the society. This may result in a conclusion that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is historical logic instead of the economic one.

Easily Equalizing and Hardly Relieving under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A special village case *Cao Zhenghan* 18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s morally aimed at providing survival security for 900 million peasants. Nevertheless, since in most villages the cultivated land per person could not sustain himself, whether villagers can obtain basic existence security from collective lan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village leader is a dependable capital trustee for villagers and whether he holds the desire of helping the villagers deal with their existence security. Without leaders like this, villagers have to give up their claim for existence security, and claim for the equal right to use and derive benefit from village land instead. However, under current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the villages, it's hard to meet such a leader. Therefore, in the majority of villages, it's impossible for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villagers' existence indeed.